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动向 闻一多随笔/闻一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3994-3

I. 历… II. 闻…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412 号

书 名: 历史动向 闻一多随笔

著作责任者: 闻一多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封 面 制 作: 石枕寒流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3994-3/G · 240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13 千字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文化精神	(1)
“四杰”	(3)
孟浩然	(9)
贾岛	(14)
杜甫	(18)
庄子	(30)
龙凤	(43)
神仙考	(47)
歌与诗	(59)
说舞	(70)
类书与诗	(76)
宫体诗的自赎	(83)
端节的历史教育	(93)
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97)
道教的精神	(109)
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	(117)
时代声音	(123)
黄纸条告	(125)
悼玮德	(127)
关于儒·道·土匪	(130)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134)
愈战愈强	(139)
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的演讲	(142)
一个白日梦	(144)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146)
妇女解放问题	(150)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154)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	(157)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159)
最后一次的讲演——在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	
大会上的讲演	(164)
文明建设	(167)
建设的美术	(169)
电影是不是艺术	(173)
《女神》之时代精神	(181)
泰果尔批评	(188)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193)
诗人的横蛮	(195)
诗的格律	(197)
戏剧的歧途	(204)
先拉飞主义	(207)
文学的历史动向	(218)
《西南采风录》序	(223)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226)
匡斋谈艺	(231)
字与画	(234)
冯法祀战地写生画展观后感	(237)
战后文艺的道路	(239)

文化精神

>>> 闻一多 历史动向 >>> 历史动向 >>> 历史动向

“四 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个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一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

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做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赞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

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他原来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排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

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以“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诗句: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

——《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

——《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

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绀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需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边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属对能。

——《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杀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左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
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
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人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

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唯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意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五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

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做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

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对于他，诗的需要便当减少了。果然，他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做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才如果是指才情与才学二者而言，那就对了；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
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
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
衡门犹未掩，停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
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
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作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

散朗”的姿态。读到“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我们得到一如张洎从画像所得到的印象，“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得到了象，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的另一解释。

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谁能了解庄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诗，当然也得承认那点“累”。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作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作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愿躲在幽静的角落里作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作诗。作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作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混得一“第”，到那时，

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作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作一辈子的诗，为责任作诗以自课，为情绪作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

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作诗，我们已经明白了，但为什么单作五律呢？这也许得再说明一下。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作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作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作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然而作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我们在上文说那是由于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点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这点，便明白了整个的贾岛。

我们该记得贾岛曾经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然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早年记忆中——“坐学白骨塔”或“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的禅味，不但是“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月落看心次，云在闭目中”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甚至“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的渊源。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唯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借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